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三)

# 毛泽东与 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主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



#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主义

〔美〕莫里斯·迈斯纳 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内部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3471/13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

**MAOZEDONG YU MAKESIZHUYI WUTUOBANGZHUY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1740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 32开 8.25印张 186,000字 00,001—10,000册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73-0030-7/C·3 内部发行 定价4.50元**

## 丛书出版说明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著。

为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和动态，为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定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内部参考。

这个选辑以丛书形式出版，主要选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提供原始资料为主，其中既有专著，也包括论文汇编；既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形式根据编选内容而定，不强求一律，编者只作必要的编辑和评注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力求比较客观、系统地反映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希望能够起到开拓理论视野、扩展思维空间、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本丛书编辑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主持，并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以合作方式参加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86年10月

### 第三辑编者的话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之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某些重大失误。这些失误的原因何在，人们应当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特殊规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们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四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有重大现实意义。

这些问题自然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浓厚兴趣。近年来，他们就此发表了许多著述，其中既包含某些值得注意的独到见解，也有许多我们不能同意的错误观点。掌握这些情况，有助于深化我们的研究工作。为帮助国内理论工作者了解西方学者有关研究状况，我们组织翻译了迈斯纳教授的这部著作。

迈斯纳教授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现为美国历史学会、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他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从六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围绕毛泽东的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共产主义理论中的苦行主义价值观和乌托邦目标》、《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某些民粹派观点》、《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中国社会的前途》等。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原名为：《马

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可说是他在这一领域多年研究的集大成，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观点。此书英文版1982年出版后，曾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迈斯纳教授的这本文集，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空想观念的关系。诚然，迈斯纳教授对毛泽东的某些空想观念的理论实质，产生的思想和历史原因，在政治经济理论、价值观、理想观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种种表现形态，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系统的分析。他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迈斯纳教授有些观点的立论较为偏颇。例如，他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空想观念的实质是否认或忽视社会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试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点，毛泽东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依靠力量问题上形成了实际上轻视工人阶级而重视农民的倾向，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形成了立足农村的反城市倾向，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论倾向。这样，迈斯纳教授实际上基本否定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迈斯纳教授提出的有些问题不是不可以继续研究的，但是，也不能不指出一些基本的事实。毛泽东是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系列问题的。毛泽东的观点和思路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但在社会主义要不要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从未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发生过怀疑和动摇。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都反复强调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一再以近百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倍受屈辱的惨痛事实唤起全党对此的高度重视。至于怎样才能

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则有不同的考虑。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要以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替代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表明他形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造可以同步进行的新思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之后,毛泽东探索的则主要是如何在新制度下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尽管这种观点和思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确有脱离实际的缺陷和失误,但它们在整体上毕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否则就很难说明,毛泽东为什么能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作出重大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和纠正自己的某些失误。

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的问题上,也应指出如下事实:第一,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坚定地以无产阶级作为领导力量,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怀疑;第二,由于农民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无产阶级在革命和建设必须以广大劳动农民作为最可靠的同盟军,领导他们共同前进。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这种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第三,毛泽东对个体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时一再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第四,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无疑使毛泽东更了解农民,并有意无意受到农民意识的某些影响,但显然不能就此得出毛泽东只是代表和依靠农民的结论。

在这部著作中,迈斯纳教授还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透视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进程。他认为，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并非同义语，并注意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现在看来，这样一些问题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一位西方学者早在1982年就能对此有所觉察并提出尖锐的批评，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迈斯纳教授的分析也有误解和偏激之处。例如，他往往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具体工作上的失误、个别人的错误观点，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混为一谈，甚至把改革开放的理论同毛泽东的思想，现代化建设同社会主义，也简单地视为对立的两极。对于书中的类似偏激之言，相信广大读者能作出正确的评估和判断。

在研究方法上，迈斯纳教授广泛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是值得重视的。他以马克思、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作为参照系审视毛泽东的观点和思路，确实有助于人们拓展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深化对问题的思考。这种方法值得国内理论界借鉴。但是，迈斯纳教授的比较研究往往停留在现象层次，以毛泽东同经典作家某些表面的差异作为立论的根据，对毛泽东与之不同的观点、命题和思路的理论内涵及历史根据却缺乏透彻的剖析。

迈斯纳教授为描述和分析毛泽东的有关思想，作了大量文献资料准备工作，这是本书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基础。但应坦率地指出，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也有明显的缺陷。例如，一些立论的引证往往不够准确全面，对毛泽东某些观点的描述失实；大量使用“毛主义”或“毛主义者”这类界定模糊的概念，把一些不属于毛泽东的观点当作分析毛泽东的思想的依据。这种分析使本书减色不少。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书名作了改动。

由于文化背景和思想体系的不同，要求迈斯纳教授对所有

问题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编译这本书的着眼点在于，它提出的问题、观察的角度和研究的思路能促使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好在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是为社会进步而向历史寻求智慧，即使是对立观点的激烈碰撞，也会以迸发出的火花为我们照亮探索的道路。

本书根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全文译出，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仅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工作。参加翻译工作的有：陈葆华（第一、二章）、田松年（前言、第三章）、朱宝宪（第四章）、平新乔（第五章）、赵立平（第六章）、张宁（第七章）和梁刚（第八章）。参加校订工作的有：张宁（前言、第一、二、四、六、八章）、陈铭康（第三、五、七章）、陈启伟（第一章部分）和张爱茹（第七章部分）。石仲泉、张宁负责本书的统稿和编审，张爱茹协助进行了工作。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翻译和编审工作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0年1月

## 序 言

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毛主义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公布了他们拖延已久的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地位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冗长的决议，虽然断定毛“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但对他最后20年的统治，仍然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决议开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历数了毛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浩劫”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恶果。按照官方的评价，毛晚年最突出的错误之一，是曾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空想的”、“非科学的”那种政治和思想倾向。毛被指责“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沉溺于“脱离实际的”思想和实践方式，对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到来抱有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他的“空想的”异端思想，由于违背了据说存在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受到了与他不同的、具有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观点的当今北京领导人的非难。

在谴责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方面，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学者，长期以来走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人前面。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大多数外国学者就认为毛的思想和政策与可能是普遍必然的现代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完全不一致，是轻率的空想，荒谬的狂热。在毛主义时代，有不少其他

西方评论家曾在毛主义中发现了非常之多的优点，但他们现在终于认识到，他们观察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既然北京方面已正式揭露了这些错误），并且加入了对毛的继任者奉行的新路线的普遍赞扬之中。研究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学者和大多数西方学者，异乎寻常地同声称颂中国新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和他们对“四个现代化”的认真追求。

象在北京领导人和外国评论家中流行的方式一样，把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丢进历史的垃圾堆，自然是非常符合时代的普遍倾向的。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乌托邦幻想，不仅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中，已经差不多消失了。弗兰克·曼纽尔和弗里奇·曼纽尔敏锐地判定，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自己技术的社会重负之下被压垮的话，它们就要忍受令人痛苦的自我矛盾。

正当新的、辉煌的科学力量变得对我们有用之时，我们却面临一种贫困——缺少对乌托邦的虚构想象……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能够以合理的精确度，略述在中间空虚的慧星或小行星上建立一个太空移民聚居地所必需的过程。但当描述人们在那儿将要做什么时，这个领域中最活跃的人物也只是在一个无重力的新环境中，为我们重现了包括花园俱乐部和其他一切在内的城市郊区。

两位曼纽尔有很好的和更充分的理由对如下现象大发感慨：“制造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科技手段的积累与可悲的目标贫乏之间脱节。”①

在共产党国家里，目标的贫乏同样令人可悲。在过去数十年里，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是未来的希望，而现在

## 序 言

则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并未产生。现代经济发展目标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想——与此相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几乎蜕变得和一些现代流行的思想别无二致，令人生厌的思想宣传仅仅用来掩盖官僚主义作者们陈腐的民族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世界工业舞台上的后来者，它们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旧外套，仿效资本主义前辈“积累着技术手段”，正在把一场历史上的摹仿闹剧演到底。

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惊的缺少幻想的时代。对于想象人类的未来要比现代工业社会包含更多假定的“合理性”的人们来说，匆忙地称赞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乌托邦思想的再现，也许还不是时候。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的烙印可能不再和政治有任何关联，但它确实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它的意义应当用历史上的和从人的角度能理解的语言来领会。把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作为一种不幸的历史失误加以消除——不管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还是由公认的“现代化过程”的理论家来完成这种消除——无助于促进人们理解过去，也不会象以往那样，为那些仍然憧憬和争取新的更美好的未来的人们，提供本来必需的指导。

本书是一个探索，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从不同的理性和历史的出发点探索毛主义思想中那些空想方面的互相联系的过程。它首先是关于毛主义的思想史的研究，应当着重指出，这个研究限于（和限定在）与毛泽东的思想的空想方面直接相关的论题和问题上。当然，毛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思想，但从整体上讨论毛主义的理论或由它而来的政治实践，不是眼下进行的探索的目的。但毛思想的空想方面在历史上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本书也不希望仅仅是一种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虽然毛的“空想”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正统观念，但下列各章将会表明，这对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遗产改造为在现代中国历史环境中切合革命需要的学说，还是必不可少的。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很多独具特色的东西之所以形成，同1949年之后毛的乌托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不是舶来的思想珍玩，而是一种与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紧密相关的历史现象。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评估毛主义时代的历史成果。在早先的一本书里，我提出了我一直坚持的看法——毛主义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断言，尽管这个尝试在历史上值得注意，但人们最终将会发现它是徒劳一场。<sup>②</sup>毛泽东象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也许比他们更为热心——竭力要在他的时代获得在历史上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以便获得可以得到的东西。但凡历史评价，无论哪一种，总想切近毛泽东和毛主义的时代（历史评价没有一锤定音的）。毛主义的时代将作为伟大的乌托邦插曲之一记载在世界历史上，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的作用的人们，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将继续关心毛主义的历史。在经历了缺乏乌托邦憧憬的年代之后，这也许是值得回顾的历史。

本书的八章中有五章原来曾作为文章发表过。感谢这些文章原来的出版者，他们同意我将这些文章收入现在这本书中。这五篇文章（第二、三、四、五章和第七章）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现在北京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时期写成的，它们无疑带有那个时期的痕迹和缺点。但既然我现在和当时对毛

主义性质的看法实质上是一样的，我就不打算为在历史上充当事后诸葛亮所能偶尔得到的可疑的好处去重写它们。除了风格上的变化以外，它们在内容和阐述方面仍保持了原先写作的样子，未做任何剪裁来适应当前流行的说法。有三章（第一、六和八章）是专门为本书准备的。

谨向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术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致谢，他们给我提供了写作本书的大部分自由时间。我特别感谢林恩·卢伯克曼，他的意见和洞察力对本书的内容有很大贡献。此外，他为筹备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部分必需的工作。我也要感谢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伊丽莎白·斯坦伯格，她是使我思想振奋、得到精神鼓励的永久源泉。我把这本书满怀深情地献给我的儿子杰夫，他将把对现代技术带给人类的益处的赞赏同对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社会幻想结合起来。

莫里斯·迈斯纳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1981年8月

## 注 释

① 弗兰克·E·曼纽尔和弗里奇·P·曼纽尔：《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11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纽约弗里出版社，1977年版）。

# 目 录

|                                            |         |
|--------------------------------------------|---------|
| 序 言 .....                                  | ( 1 )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                      | ( 1 )   |
| 第二章 毛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br>题：城乡关系 .....          | ( 29 )  |
| 第三章 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中国马 克思<br>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 ..... | ( 79 )  |
| 第四章 毛主义中的乌托邦目标与苦行<br>价值观 .....             | ( 123 ) |
| 第五章 巴黎公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br>中的反映 .....          | ( 138 ) |
| 第六章 对毛泽东的崇拜 .....                          | ( 162 ) |
| 第七章 毛主义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br>理想化成分 .....         | ( 191 ) |
| 第八章 乌托邦的形式化：毛主义时代后的<br>中国马克思主义 .....       | ( 220 ) |

## 第 一 章

#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 一、历史与乌托邦

刘易斯·芒福德有一次曾经指出，“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芒福德还指出，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把这个词引入了现代政治论述，并指出其两种截然不同的希腊语来源，Eutopia的意思是“福地乐土”，而Outopia的意思是“乌有之乡”，从而意识到这个词的两种含义。<sup>①</sup>

“乌托邦”的词意含糊——既表示努力追求“福地乐土”的崇高，又表示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反映了乌托邦思维方式固有的含混性以及它同历史的含糊不清的关系。因为乌托邦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道德要求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前景，它们两者并不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的意识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道德感伤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的“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

然而乌托邦一词的模糊含义恰恰是它的优点，而不是它的缺点。正因为乌托邦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它的确是某种在历史上未必会有而且也许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理智的和历史的持续活力。乌托邦幻想的历史意义和效用一直为人们所注意。乌托邦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概念与现实的世界发生抵触，就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感，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一种希望感，从而为人类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的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sup>②</sup>

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象韦伯曾经指出的，“如果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力求取得不可能的东西，人类就不会获得可能的东西了”。<sup>③</sup>也正象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sup>④</sup>但是如果不同时摒弃历史和乌托邦，历史发展的进程就决不可能完全按照乌托邦的模式来塑造。假如乌托邦业已实现，那么它也就失去其历史意义了。因为历史是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包含着过程 and 变化；而乌托邦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应当是静止的、不动的、无生命和枯燥的状态。如果乌托邦已然实现，就将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在启蒙运动导入了把历史看作进步这种观念以前，乌托邦和历史的这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是不成其为问题的，或者至少还没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乌托邦思想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截至18世纪末叶，西方世俗的乌托邦思想的悠久传统，既不含有历史的期望，也不要求政治上的积极行动。正象朱迪思·希克拉曾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先生及其效法者，乌